

记者 李文璇
实习生 李雨鑫 济南报道

听刘一曼说——
考古甲骨有多复杂?

刘一曼,生于1940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。她从1973年接触甲骨文,生命中的52年投入到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,直到今天,依旧孜孜以求,不曾停息……

刘一曼首次与甲骨“结缘”是在1973年,她参加了安阳小屯南地的发掘工作。尽管现在的刘一曼已是殷墟考古发掘的“功勋人物”,可时年33岁的刘一曼只能算考古学界的“初生牛犊”,考古队里派了两位技工,手把手地教她如何进行考古发掘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6月18日,刘一曼的探方中出现了一个灰坑,她将其编号为H24。这是考古发掘中常见的遗迹,是由于古人利用废弃的窖穴或凹坑倾倒垃圾而形成。

那一年,安阳小屯南地共发现甲骨上万片,其中有字甲骨5335片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甲骨文最多的一次。刘一曼主持发掘的H24坑,出土刻辞卜骨1251片,是当年出土有字卜骨最多的考古单位。

刘一曼与甲骨的故事还在上演。1991年,为配合筑路工程,安阳考古工作队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钻探,在距地表3米深处时,发现了编号为H3的长方形甲骨窖穴。刘一曼作为领队,主持了这次考古发掘。

最终,这个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1583片,包括有字甲骨689片,成为殷墟甲骨史上的第三次重要发现。

充满未知的甲骨发掘足以令人惊喜,但惊喜过后,甲骨的整理和研究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。由于这批甲骨破损严重,刘一曼等人仅在粘对、拼合上就花了快两年时间。此后,做摹本、拓片、做索引,经过12年耐心细致的整理,发掘报告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才终于出版。

对于自己毕生从事的甲骨文发掘和研究工作,刘一曼感触颇深,面对镜头,她有感而发:“拼对,缀合,粘好。弄好了,然后才能够拓片。有的字怎么拓也拓不出来,那就没办法,只能做摹本。先做一个铅笔稿,矫正以后,再上墨线,最后还要做索引。所以这个工作也是比较麻烦的。但是这个工作有个好处,别人看你的书,想查

这个字,只要看这个像鹿的动物,一下子就找出来了。给读者、研究者带来很大的方便,但是这个工作很费时间……”

听袁仲一说——
兵马俑胡子有多少种

秦始皇陵兵马俑,世界八大奇迹。漫步于俑坑旁,游人往往遥想大秦帝国的宏盛辉煌,93岁的“兵马俑之父”袁仲一却总有无限感怀涌上心头,原因无他,只因这里藏着与故友的珍贵回忆。

袁仲一,生于1932年,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原馆长,现任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。他为什么被称为“兵马俑之父”?

时针拨回1974年7月,袁仲一和同事乘着卡车风尘仆仆地赶往骊山脚下的西杨村,执行一项紧急发掘任务。此前,这里的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陶俑残片。他当时没有想到,自己的后半生就此与兵马俑紧密相连。

任务时间本来仅在一周左右,但袁仲一等人的考古工作却没能轻易收尾。原来,他们在测定俑坑时,迟迟无法找到其边界。这意味着俑坑是一处规模颇大的遗址,袁仲一感到人手不足,先后从陕西文物单位调来了程学华、王玉清等考古队员。1975年3月,当三个试掘方挖完后,一个东西长230米、南北宽62米的俑坑出现了,这就是兵马俑一号坑;1976年2月,考古队在一号坑北侧20米和25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和三号兵马俑坑。

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奇迹重见天日,袁仲一至今难忘那种激动喜悦。他对秦始皇陵兵马俑做了这样的概括:大、多、真。“大”在于“个头”,一般的陶俑仅有几十厘米高,而兵马俑则通常在1米8左右;“多”在于数量,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俑坑内共有约8000件兵马俑,如同一个庞大的“地下军团”;“真”则是逼真,仅胡须就有24种,以细节反映人物的性格,堪称“千人千面,多彩多姿”。

兵马俑到底是谁做的,怎么会做得那么像呢?为探究这一谜团,袁仲一用三个月的时间下坑给兵马俑“相面”,终于从兵马俑身上发现了人名,也就是工匠的名字。正所谓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成”,由此可以推算出,参与兵马俑制作工作的是上千人,来自全国多地。这样的研究工作,即使到他退休后也没有停止。

不过,王明达等人没有就此放弃,终于,在3号探方的中部,王明达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。墓口出现!然而,大家雀跃的心很快又沉了下

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。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至今已逾百年,几代考古人以坚韧的毅力和对历史的敬畏,在岁月的尘埃中探寻着人类的记忆与智慧。

秦始皇陵兵马俑是怎么发现的?在无人区考古是一种怎样的感受?近日,纪录片《考古者说》在CCTV-9热播,讲述了六位考古学家非凡的考古故事。这六位考古学家都是谁?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故事?

兵马俑的胡子有几种?

央视推出六集纪录片《考古者说》,

听王明达说——
啥“宝贝”让他“逮着了”

王明达是与良渚遗址密不可分的。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,自1966年便投身于浙江考古工作。

良渚遗址首次现世是在1936年,然而,多年以来,作为命名地的浙江,却一直没有发现重要的良渚文物,埋藏于地下的良渚遗迹究竟在哪里?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每个浙江考古人的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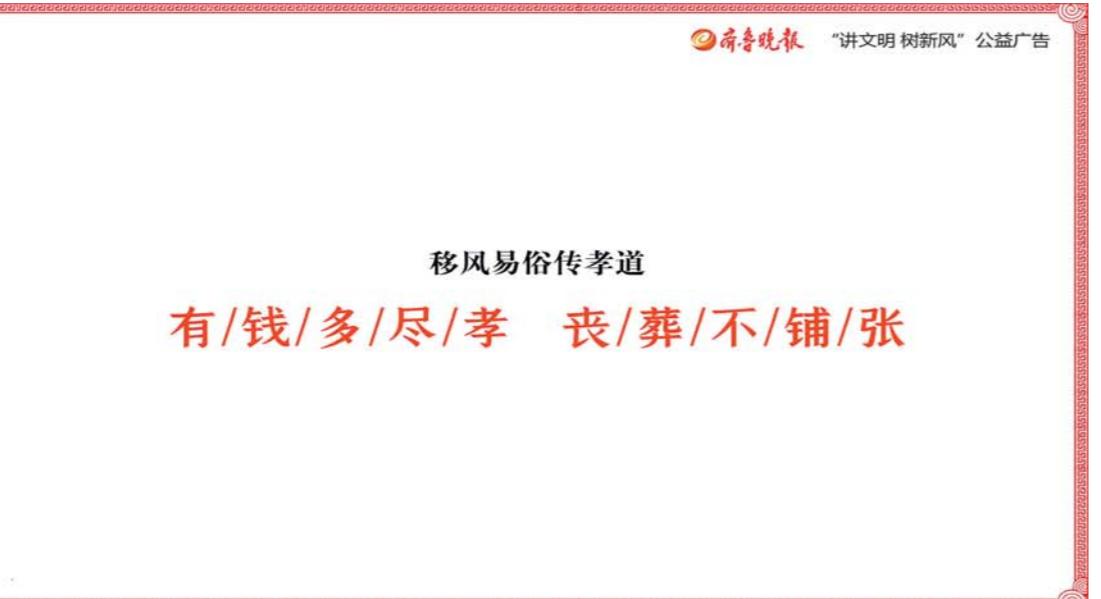
1985年,王明达等人接过了良渚遗址调查的“接力棒”,他们跑遍了杭州周边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,却一无所获。转折出现在年底,王明达注意到一个叫“反山”的地方,契机则来自于一次意外的事件:一家乡镇企业选中反山的大片土地,准备兴建厂房。

1986年,反山被迫进入抢救性发掘,王明达担任领队,表土挖去不久,考古队就有了收获,却其实打实地属于“意外”——他们挖出了11座汉墓。那么,这处遗址会有良渚墓葬吗?谁的心里都没底。要知道,20世纪80年代之前,长三角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极少发现带墓坑的史前墓葬,以致考古学界有声音说,良渚古人的葬俗就是“不挖墓坑、平地掩埋”。

兵马俑到底是谁做的,怎么会做得那么像呢?为探究这一谜团,袁仲一用三个月的时间下坑给兵马俑“相面”,终于从兵马俑身上发现了人名,也就是工匠的名字。正所谓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成”,由此可以推算出,参与兵马俑制作工作的是上千人,来自全国多地。这样的研究工作,即使到他退休后也没有停止。

移风易俗传孝道

有钱/多/尽/孝 丧/葬/不/铺/张



胡兴军和考古队员们在烽燧遗址考古。 本版图片均为《考古者说》剧组提供



在罗布泊考古啥体验?

听听这六位考古学家说什么

近日,纪录片《考古者说》热播,将镜头对准六位不同领域的考古学家,讲述了他们精彩的考古故事。为什么选择考古学家作为“主角”?纪录片有啥幕后故事?记者对《考古者说》导演张兵进行了采访。

记者 李文璇 济南报道

考古人的生活值得记录和表现

考古文博类纪录片历来深受观众喜爱,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。它们或讲述国宝文物的故事,或以遗址为切入点揭开历史风云。从这个角度看,《考古者说》以考古学家作为故事的主人公,可以说是“另辟蹊径”。

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拍摄视角呢?张兵的回答很简单:考古人的生活本就值得去记录和表现。

在他看来,中国考古诞生百年来,每一座遗址的发现和发掘,每一件文物的出土和修复,都是中国考古人智慧和辛勤的结晶。假如没有他们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起文明的碎片,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不会如此瑰丽多彩。

与这样的贡献似乎不相匹配的是,考古人的生活往往并不为人所知。“考古一度是个冷门学科,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格言就是‘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说半句空’,这形成了考古学界相对低调的传统。”从事纪录片拍摄二十多年的张兵觉得,自己有义务去讲述他们的故事。

刘一曼、袁仲一、王明达、孙健、胡兴军、张东菊这六位“考古人”就这样成了纪录片的“主角”,《考古者说》围绕他们投入最多心血的考古发掘而展开。这些考古学家家里最年长的已年过九旬,最年轻的则是80后,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。

“从播出的顺序可以看出,六位考古学家代表了我国考古学的不同阶段,从殷墟到兵马俑,再到‘南海一号’,直至高原远古人类的追寻,体现出考古事业的发展脉络。”张兵说。

“择一事,终一生”是他们的信仰

为啥选择这六位考古学家作为拍摄对象呢?张兵坦言,在确定人物时,自己也犯了“选择困难症”,为此请教了多位考古学界的专家,听取他们的建议,最终梳理出上述人物。

拍纪录片是个“慢工出细活”的过程,虽然《考古者说》每集只有15分钟,但拍摄周期却长达近一年。张兵向记者介绍,纪录片的拍摄团队有十几人,分为三组,先后赴浙江、广东、河南、陕西、青海、新疆等地取景,胡兴军等人深入过的无人区,张东菊团队走过的青藏高原,如今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

在拍摄过程中,考古学家执着、坚韧的职业精神给张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作为殷墟甲骨的发掘和研究者,刘一曼从1973年至今一直笔耕不辍;“兵马俑之父”袁仲一如今过九旬,平时沉默安静,但一谈起兵马俑,眼睛里总是神采飞扬;“南海一号”的考古领队孙健从22岁起开始寻找这艘古船,将人生最精彩的年华投入了沉船的发现、打捞和保护中……

是什么让这群“考古人”为考古发现一直坚守?张兵说,“择一事,终一生”是很多考古学家的回答,在瞬息万变的今天,这种坚守显得尤为可贵。他们的这种精神,既令人敬佩,又令人羡慕。

张兵向记者透露,《考古者说》的续集正在考虑之中。在他看来,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中国人的审美,每一座遗址都讲述着先民的故事,考古研究就是研究我们自己,回望过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。

《考古者说》导演张兵讲述纪录片拍摄幕后的故事

